

佐藤春夫旅台文学作品整体叙事策略研究

张剑, 宋琳

(湖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永州 425199)

摘要:佐藤春夫是日本来台作家中建立旅行文学的肇建者。1920年6月底至10月中旬,佐藤春夫到台湾旅行。回到日本后,他发表了多部与台湾相关的文学作品,在叙事上表现出了不同的策略和创作态度。从文化、政治以及审美角度三个方面对佐藤春夫旅台文学作品的整体叙事策略进行研究,归纳其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佐藤春夫;旅台文学作品;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7)09-0118-04

1920年6月底至10月中旬,日本作家佐藤春夫(1892-1964)到中国台湾旅行。这不但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台湾之旅,也是他有生以来首次远行。旅行期间,他还跨海到中国的福建厦门游览了2个星期。抵达台湾后,佐藤春夫认识了影响他此趟旅行的重要人物森丑之助,一位人格气质皆令他相当赞赏的人类学者。当时日本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森丑之助任职台北博物馆馆长。他对佐藤春夫释放出极大的善意,亲自写信对他的旅台行程提出建议,佐藤春夫到福建厦门也出自他的推介。由于森丑之助的引荐,佐藤春夫在滞留期间受到当时台湾民政长官下村宏派令的特别照顾,沿途各地获得盛情招待^[1]。

另一方面,相较于在台湾旅行期间的诸多便利,佐藤春夫在福建旅行期间由于语言隔阂以及文化落差,甚至是随行向导的疏忽,明显感受到客居异乡的寂寥与不安。返回日本后,佐藤于1921~1937年间陆续发表了多篇与闽台旅行相关的作品,体裁包括了小说、游记与散文。这些文章多半来自他实际的旅行体验,具有纪行文的性质。本文将从文化、政治以及审美角度三个方面对佐藤春夫旅台文学作品的整体叙事策略进行研究。

1 文化使者——佐藤春夫的中国书写

佐藤春夫对中国古典文化极为偏爱,长于在文学创作中书写“中国趣味”。在日本侵华期间,他以“文化使者”身份4次走进中国,并创作了相关作品。

日据时期的台湾多元文化并存。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和台湾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色彩,在冲突中融合,相互影响。阅读这一时期佐藤春夫的旅台作品,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他作为一种“文化使者”对殖民地台湾的神秘感、情趣感,也能感受到他作为殖民国作家具有的高傲。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人在文化认同上出现了危机,但是台湾社会正快速迈向现代化。当时大陆方面,广东沿岸一带正处在粤桂两军开战的前夕,到处动荡不安,弥漫着人心惶惶的气氛。两岸的政治局势与社会民情迥然不同,也影响到旅者的心情。因此,通过在两地不同环境下的旅行,佐藤春夫往往在回忆文字中肯定台湾旅行的成功。佐藤春夫曾说过,殖民地之旅是促使他

收稿日期:2017070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XSP17YBZZ041)

作者简介:张剑(1980-),女,湖北宜昌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日本文学、中日文学关系研究。

更急于深入了解“南方”而到南洋群岛从军的契机。

佐藤春夫是日本来台作家中建立旅行文学的肇建者。佐藤春夫的《雾社》(1936)是日据时期日本本土作家最早以台湾为取材对象的散文作品。佐藤春夫终生只来过台湾一次,他旅台的时间是1920年6月底至10月中旬。由于此行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款待,佐藤春夫得以畅游台湾各地。返回日本后,从1921年(大正10年)到1937年(昭和12年)之间,他陆续发表了12篇与这次旅行相关的小说、游记和散文。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佐藤春夫笔下既有对异国情调、山水风物的喜爱,对殖民地原住民悲惨生活的同情,也有对日本近代化和外来文化的批评,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描写和指责,更多的则是对日籍移民者态度和观点的客观性描述。如他在作品中认为:日月潭是神赐的美地,日本总督府不应该因私利而破坏这里的原始景色。但通过佐藤春夫对水社蕃民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与舞蹈的批评,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异域文化交流带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他试图利用日本文化改造原住民自身文化的想法,有一定的文化殖民意味。

2 “理蕃”背景下的“文明人”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使这一时期的一大批作家背离了“艺术理想”,为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推行文化霸权,积极进行“国策文学”创作。佐藤春夫也不例外,他在旅台文学创作中化身“文明人”,配合日本政府的“理蕃”政策,宣传殖民者的“理蕃”成果。

理蕃政策是指1895~1945年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时期对于台湾原住民所研拟与实施的特别法规与政策的总称。“蕃”于此间,即指台湾原住民,而执行此政策者为当时于该地行使统治权的台湾总督府。为达成对台湾山地的控制,日本殖民者实施的“理蕃政策”对台湾原住民的统治相当严酷。这一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倒退的,也就是说回到了清代前期土牛划界、汉“蕃”隔离的旧时代,与清末以来开山抚“蕃”、汉“蕃”融合的历史进步趋势相背离。

佐藤说:“我到这个森林来,好不容易总算在此嗅到蕃人族群的生活气息。我的目的可说已达到了。”^[2]。这应该是一种朝圣的心情,向自然朝圣、回归原始的心情。诚然,台湾山地在一九二〇年代左右虽然普遍已经没有猎首的行为,但世情仍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到“蕃地”旅行还是有风险。由于受到森丑之助的影响,佐藤春夫不仅遵照他的行程安排进入台湾深山,而且也以朝圣者的姿态,希望能感受到原始族群的生活气息。当然,他也必须具备探险的勇气。

佐藤春夫创作旅台文学的初衷是为配合日本政府的“理蕃”政策,宣传殖民者的“理蕃”成果。他一系列的作品虽然充满了古典的情绪和唯美的浪漫主义,但描写自然风光和中国趣味的传说时却带着浓浓的日本意识。如他笔下主张的日本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友爱”理想,与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宣扬的“大东亚论”异曲同工。

佐藤春夫在9月中旬,开始依照森丑之助为他拟定的旅行计划,从高雄出发前往台湾中部山区。由于作家身份,这次旅行不仅一路上都受到官方的接待,而且交通也较为便利。沿途不仅有日据时期绵密的支线路网,还可以搭乘各制糖会社经营的私铁和手押轨道,这使旅途充满了情趣。在佐藤春夫的纪行文中,可以看到他对搭乘不同交通工具的描写,如《蝗虫的大旅行》(1926)用童趣般的笔调叙述了作者在从嘉义到二水的铁道上和一只蝗虫共同搭乘火车的有趣体验。这篇小品文不但勾勒出作者的旅行风景,还显现出他对于自然界观察的亲密感及敏锐度。

从《蝗虫的大旅行》以降,要考察佐藤春夫的台湾旅行动态,可以在《日月潭游记》(1925)与《旅人》(1924)中得到更为清晰的线索。这两部作品所书写的时空其实是重叠的,因此它们之间也有一种互文关系。两部作品相互对照后,就可以接续上《蝗虫的大旅行》之后的旅程路线。从二水下车后,作者搭乘了制糖会社的私铁。但由于浊水溪泛滥,沿线的铁轨被冲毁,他下车步行了好长一段路后换搭另一列车。途中在某个车站下车后,又搭乘台湾电力会社的台车到集集停宿一晚。他第二天才坐着由苦力所抬的椅轿到日月潭参观。《日月潭游记》与《旅人》主要是描述这段旅程的见闻。

其实,在转搭台车进入集集之前,佐藤春夫并不知道自己此行会受到殖民当局盛情的招待:“在一个不知名的寒村小站,我下了车,实在不想下,可是车子已不再前进了。我有点日暮途穷之感了。”出乎意料的是,在剪票口竟然有一位年轻的绅士在等他。“从这里开始,我在这王土之边的山中,有三天左右,受到贵宾似的招待。”^[3]可见,佐藤春夫在内心深处也把日本侵占台湾合理化,把台湾视为日本“王土”的一部分。作者在这趟旅程中,获得相当多的人力支援。此外,在交通方面也是大费周章,历经各种方式才逐步接近雾社山区。佐藤春夫先前本来拟定要去阿里山,遭受到大台风的影响,导致登山铁道完全不通而取消了行程。因此,佐藤春夫特别担心从日月潭能否顺利抵达雾社。

佐藤春夫在《日月潭游记》一开头就提到,当他准备从集集前往雾社之际,在下榻的旅馆里耳闻山地的高山族爆发“萨拉玛欧蕃”事件:“无意间,邻室的高谈阔论声传来,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生蕃蜂起,雾社的日本人全灭的消息。雾社,乃是在参观完日月潭之后我所要前往的地方。我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到蕃界去一趟,也想去名叫高山的地地区参观一下。”^[4]由于当时人们误传事发的地点就在雾社,所以连平地的埔里地区也浮动着不安的情绪。因此,他在《雾社》之初便传达了这样的疑惑:“雾社本就是蕃界的第一大都会——这样说大概不夸张,那里至少住有一百多个日本人,而且那个社里的‘蕃人’也应该不那么野蛮才是。一百多个日本人悉数被杀,这件事是绝不可能的。”^[2]雾社在一九二〇年代之初,已经是个步入文明的现代城镇,所以佐藤春夫才会对传闻有所质疑。他当然不会料到,这段谣传在10年后的1930年(昭和5年)竟然成为事实,而爆发了震惊殖民者的“雾社事件”。

安闲地住惯了之后,他们甚至不知道,其他同类的人,已渐渐逃入深山之处,而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了王土之民了。丢弃勇猛的精神,沉醉在别人施舍的美酒中,用祖先传来的神圣的歌与舞蹈,献媚于好奇的旅客……喂!你们可知道在雾社的深山处,你们的同伴现在正在对我们的同伴进行可怕的攻杀吗^[2]?

这一段文字,同时批判了“生蕃”与“化蕃”。作者把日本人塑造成无辜的受害者,“蕃人”的举止则充斥着血腥与暴力。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对旅行者献媚以换取回馈的“化蕃”,就显得柔弱,丧失人格。在作者的心目中,似乎有一个理想的“蕃人”形象。然而,他毕竟无法理解,是殖民者的权力运作让“生蕃”与“化蕃”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样的结果,也不是台湾的高山原住民所愿意看到的。他们要么被强行移住到平地,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要么就必须逃往更深的山林,而终日惶惶于日本军队的追击。可以说佐藤春夫在面对“蕃人”暴动时,显现出来的危机意识是日本人的正常反应。因此,他会抽离旅行者的情绪,站在殖民者的立场,甚至用所谓“文明者”的观察视域来进行批判。

3 “知风流”者的“无常美感”

佐藤春夫曾经在他的杂文《“风流”论》中表述:“人类的意志在最小限度活动时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这是由人类的‘无常观’决定的。”他认为,“风流”是艺术的至高境界,“艺术”应是“在形式上近于沉默、虚无,在内容上顺其自然”^[5]。“知风流”者能从自然中感受到“生”的乐趣和美感,并且善于发现、表现这种乐趣和美感^[6]。

佐藤春夫的“风流论”在审美范畴上源于佛教“无常观”生发的“无常美感”,其根本是感觉论、感性论。从“无常观”生发的“物哀”是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这种审美思维强调“风流”之人擅长将个人颓废、倦怠的性情唯美化、艺术化。

作为“知风流”者,佐藤春夫在其旅台作品中通过冷静的观察,运用唯美的文学创作形式,细腻地描写了台湾秀丽的景色和人文情趣,思考了人与自然共生共感的关系,也以沉郁的抒情风格描写了日据时代的殖民政策,表达了对殖民地人们的同情。

如《旅人》和《雾社》这两篇作品几乎集中在通过对原住民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冲突和差异的描述,将唯美的情趣与颓废的情怀结合起来,并将其拓展到社会政治领域,通过质疑日本的殖民政策给台湾自然风光带来的破坏,表现了人类面对颓废、虚无的宿命而产生的孤独感、悲哀感。

自诩“知风流”者,佐藤春夫将日本传统的“物哀”“幽玄”美学思想与西方新浪漫主义创作思想融合在一起,以忧郁、颓废、冷静的笔触描写在台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渲染“荒废”的台湾意象,描写中日文明的冲突、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这种在比较中包含着具有批判意味的“日本人意识”,已经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和西方浪漫主义的唯美创作思想相去甚远。如在《孤寂》中,他以“零余者”的视角从个体生命拓展到普泛的人本困境,表现出对全体人类的生命、命运的思考^[5]。

我现在是自己关上窗户又放下了百叶帘,然后却抱怨房间太暗,不舒服(如果不喜欢阴暗就打开窗户,否则就默默地享受好了),但是,我以发牢骚为乐趣,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抱怨光线昏暗,根本不去看窗外是阳光明媚还是昏天黑地,这真是大错特错,活该^[7]!

这段文字借助内“房间太暗”和外“阳光明媚”两个场景,渲染了作者自身虚无、悲观颓废、寂寞的情绪,表达了作者对自身精神和价值的迷茫,展示了日本美学思想中的“物哀”——人与自然合一的刹那产生的美感,以此传递了人类面对颓废、虚无的宿命所产生的悲哀感。

4 结语

唯美文学强调创作者以超然的态度去追求所谓纯粹的审美生活和艺术理想,而不是面对现实和责任^[3]。佐藤春夫作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在旅台文学创作中展现了极为矛盾的创作姿态,表现在叙事策略方面,首先是在针对台湾文化书写方面带着浓浓的日本意识,凸显“现代人”的高傲。同时,以“知风流”者自居的佐藤春夫在旅台作品创作中也有意识地将日本美学理念“物哀”与西方唯美主义文学叙事策略相融合,以忧郁、颓废、冷静的笔触描写旅台见闻,着意表现“荒废”的台湾意象,描写中日文明冲突、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冲突产生的“无常美感”。

佐藤春夫旅台作品在叙事策略上背离了唯美文学追求的艺术理想,凸显了历史背景与艺术创作的矛盾性,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政策影响下作者人生观、价值观和艺术观变异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 [1] 武继平. 佐藤春夫的中国观论考[J]. 浙江学刊, 2007(5): 88-92.
- [2] 佐藤春夫. 雾社[C]//佐藤春夫全集(第5卷). 京都: 临川书店, 1998.
- [3] 佐藤春夫. 旅びと[C]//佐藤春夫全集(第5卷). 京都: 临川书店, 1998.
- [4] 佐藤春夫. 日月潭に遊ぶ記[C]//佐藤春夫全集(第27卷). 京都: 临川书店, 1999.
- [5] 齐珮. 日语中“风流”一词的语义溯源——以佐藤春夫的《“风流”论》为中心[J]. 日本问题研究, 2010(3): 50-52.
- [6] 张剑. 论佐藤春夫作品的美学归宿[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6(12): 96-99.
- [7] 佐藤春夫. 佗しすぎる[C]//佐藤春夫全集(第4卷). 京都: 临川书店, 1998.

(责任校对 刘兰霞)